

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

黃 福 慶*

摘 要

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發生兩次；一次為 1942 年，一次為 1943 年，遭受檢肅被捕的調查人員有 44 人之多。他們幾乎都是調查部的菁英，經這次事件後，調查部幾乎人人自危，調查活動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直到 1945 年日本戰敗，其間調查部的一切活動，只是苟延殘喘而已。

滿鐵調查部的人員，因有不少受到「大正民主」自由思想的洗禮，有其遠大的理想與抱負。惟自 1930 年代以後，日本政府對思想（尤其是左翼思想）的控制甚嚴，而滿鐵調查部的調查報告，是憑着他們理性的、科學的分析，作出結論，往往對日本國策有所批判，因而觸怒主控日本政局的軍方，是為導致檢肅事件的主要原因。

檢肅事件看似單純，事實上，如果將日本當時的思想潮流及滿鐵所處的特殊環境及其傳統加以分析，檢肅事件的含意是很深遠的。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

黃 福 慶

- 一、前 言
- 二、「大正民主」運動下的學生思潮
- 三、調查部的自由氣息
- 四、調查部左翼團體的形成
- 五、調查部擴大組織與軍方情結
- 六、檢肅事件的發生及其意義
- 七、結 論

一、前 言

1945 年 8 月，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因日本戰敗而解體，其所屬調查部則早於 1942 年至 1943 年之間，因兩次檢肅事件，在輝煌的歷史上，罩上一層陰影，使得調查部由盛轉衰，逐漸失去其調查功能。所謂「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是日本軍方針對左翼調查人員所採取的檢肅運動，前後發生兩次；第一次在 1942 年 9 月，第二次在 1943 年 6 月，遭受檢肅而被捕的調查人員，共有 44 人之多。他們幾乎都是調查部的中堅幹部，是調查的行家，對於資料的分析，具有獨到的能力。經這次事件，調查部不但失去很多菁英，即倖免於難者，也紛紛他調，內部瀰漫恐慌氣氛，調查活動也幾乎陷於停頓狀態。

這些被捕的調查人員之中，不少受過「大正民主」（Taisho Democracy）自由思想的洗禮，有其遠大的理想與抱負，因此在日本政府嚴加取締之下，認為中國東北（以下稱東北）是實現他們理念的新天地，乃紛紛前往東北。事實上，他們也的確在東北享受到了自由。然而也就因為如此，對於日本的國策，在調查報告中時有批評，尤其對中日戰爭的看法，讓軍方相當不悅，不僅視他們為反戰的一羣，並認定他們的想法是「敗戰」思想。當中日戰爭日益呈顯膠著狀態，形成騎虎難下的

軍方，對於這些人的存在，無異是眼中釘，肉中刺。在軍方主控一切的情勢下，採取不利於他們的行動，是必然的。

1930年代以後的日本，對思想（尤其左翼思想）的控制甚嚴，因思想問題遭受檢舉的案件，層出不窮，相形之下，調查部檢肅事件，原不足為奇。惟在殖民地執行國策的機關內，竟有這麼多人批判日本國策，確是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單從事件本身來研究，則無法凸顯其意義之所在，必須從大正以後的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潮、滿鐵所處的特殊環境與傳統等問題，加以串連起來，逐一研討，始能明瞭事件的全貌及所蘊涵的意義。本文即係基於這種構想而作了全盤性的探討。

二、「大正民主」運動下的學生思潮

「大正民主 (Taisho Democracy)」係指大正時代的民主主義運動與思潮，一般以1913年的民眾護憲運動作為大正民主思潮抬頭的年代，因這次運動，導致第三次桂太郎內閣總辭，為日本史上因民眾運動而倒閣的第一次。在民主主義運動中，最主要的是反對藩閥與軍閥的控制，主張將元老（1940年消滅）、樞密院、貴族院（以上兩院均於1947年裁撤）、軍部等特權階級的權力加以縮小，認為應將政治的重心放在議會與政黨，並實行普選，給予婦女參政權等，其中心目標在於擴大人民參與政治活動的範圍。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①與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②可以說是這一民主主義運動的兩大理論基礎。

第一次大戰後世界性的民主風潮也是促成大正民主運動的主要因素之一。尤其一向標榜民主的美國，於1917年對德宣戰，不僅是協約國致勝的關鍵，也促使美國式的民主理念、生活方式廣為世人知曉，身為協約國一員的日本，很自然地將「民主」視為象徵時代的流行語。例如當時（1917）擔任參謀次長的田中義一，在某一次演講時就說，當今的流行語，意即無論什麼事情都是講求民主，世界上任何人

① 民本主義為大正時代吉野作造所提倡，他在「中央公論」一連發表有關民本主義的論文，他主張應將政治的目的放在民眾的福利上，政策的決定必須要顧及一般民眾的意向，而具體的目標則主張政黨內閣制及實現普通選舉法。高柳光壽·竹內理三編，角川日本史辭典（東京，角川書店，1991年，第二版），頁928。

② 天皇機關說是一種憲法學說，是根據國家法人說的理論，將統治權放在作為法人的國家，以天皇為最高機關行使統治權，此與天皇主權說是對立的。此說為明治末年一木喜德郎等所主張。而自明治末年以來一直受到一木影響的美濃部達吉則將天皇機關說轉換到議會主義憲法學上，與德積八束、上杉慎吉等天皇主權說者展開論爭，至大正時代即成為定論，成為大正民主主義政黨內閣意識型態的基礎。然而至昭和以後因法西斯的抬頭，此說受到軍部與右翼分子的抨擊，1935年貴族院議員菊池武夫以「叛逆思想、學匪」加以彈劾，美濃部終於被告發，其著作受到禁止發行處分，而他也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見同上書，頁661。

似乎逐漸變成不使用這句話不可的樣子。^③同年，原敬（1914年任立憲政友會總裁，1918年9月組閣）預測戰爭所帶來政治上的結果時，認為立憲政治將因戰爭而更加進展。^④依據原敬的判斷，由於日本人被劃入擁護民主的陣營，因此將促進日本的政治民主化。1918年，日本內務省警保局以「我國的民主思潮」為題的資料中，也強調美國所倡導的擁護民主，目的不僅要確立國際上的平等主義，也意味著要各國實行民主化體制，認為其影響是既深且遠的。^⑤換言之，第一次大戰以後，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由於美國勢力的抬頭，也象徵著日本民主主義的抬頭，使日本不可抗拒地邁向政治的民主化。

以上是以政治民主化的觀點來談論大正民主主義，然而它並不限於政治概念，其範圍實際上是涵蓋著經濟、教育、文藝、美術、風俗等所謂時代文化的各種領域。我們都知道，大正時代學生受到時代潮流的衝擊，有的傾向擁護傳統，以鼓吹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為己任，有的則以自由民主主義思想者自居，為傳播新思潮而奮鬥。

(一)國家主義思想的鼓吹 大正時代主張國家主義的團體，以「猶存社」最有名。「猶存社」成立於1919年，其中心人物為北一輝，主要成員有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岩田富美夫、清水行之助、辰川龍之助、安岡正篤等人。他們喊出改造日本帝國主義及解放亞洲民族的口號，並發行機關報「雄叫」。後因大川與北一輝意見相左，於1923年宣佈解散。^⑥「猶存社」吸引不少當時就讀於京都大學的學生，日後在東北奉天執業律師並百般照顧新進滿鐵人員的中野琥逸，就是其中的一位。^⑦

「猶存社」解散後，大川周明、滿川龜太郎等於1924年成立「行地社」，他們的目的是在於提倡日本法西斯化，並經營社會教育研究所培養鬥士，致力於學生右翼團體的成立。尤其他們與軍部的少壯幹部很接近，這是軍部與右翼結合的開始。1927年，「行地社」因分裂而衰退，1932年改為「神武會」。^⑧

「行地社」成立不久，中野琥逸與岡田（後改姓里見）良作等成立「關西行地社」。主要成員為京都大學的江藤夏雄、篠原智雄、高橋道男等。其中江藤夏雄因

③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東京，中央公論社，昭和49年，初版），頁25。

④ 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卷4（東京，福村出版，昭和40年，初版），頁317。參閱大正6年9月18日之項。

⑤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頁25。

⑥ 角川日本史辭典，頁971。

⑦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下）（東京，朝日新聞社，昭和58年，初版），頁216-217。

⑧ 角川日本史辭典，頁340。

對其第五高等學校（以後簡稱五高）的學長大川周明的風格思想均極為敬仰，乃糾合同志二、三十名成立五高「東光會」，因此「東光會」與「關西行地社」有深厚的淵源。^⑨

中野琥逸為國家主義者的活躍人物，他在京都大學極力吸收同志，計蠅集了五十餘名，於 1926 年 6 月成立「京大猶興學會」。在京都大學校內擔任該會指導的有文學部教授狩野直喜、矢野仁一，經濟學部教授作田莊一。在校外擔任指導者則有大川周明、安岡正篤、笠木良明等。^⑩

其實在「京大猶興學會」成立前，關東地區已有不少類似的學生社團出現。最早出現的是「東大日の出會」。該會是由大川周明、鹿子木員信等利用 1921 年 6 月為抗議英國官員壓迫外國語大學印度籍教師自殺身亡而舉行追悼會的機會，發起組成的。此後如拓殖大學的「拓大魂の會」、早稻田大學的「早大潮の會」、慶應大學的「慶大光の會」、曹洞宗大學（駒澤大學前身）的「命の會」、明治大學的「明の會」、日本大學的「東の會」、北海道大學的「烽の會」、立命館大學的「雙刃の會」、大東文化學院的「天の會」等學生社團如燎原之火，很快擴展到日本各大學的校園內。

參與上列各社團的國家主義運動者，後來很多都前往東北，成為在思想上建設「偽滿」的前鋒部隊。尤其是「行地社」的笠木良明（東京大學畢業）赴東北後擔任滿鐵總社的人事主任，他利用職務之便，即以大連為大本營，糾集不少年輕的同志。另一方面在奉天執業律師的中野琥逸也因京都大學「猶興學會」的關係，在他身邊聚集了不少畢業於京都大學的滿鐵新進社員。由此可知，在東北致力於民族運動的日本右翼年輕分子，分佈在大連與奉天兩大據點，兩地同志每年都有兩次定期的聚會。1930 年秋天，經大家同意統一取名稱為「大雄峰會」。

「大雄峰會」主張將東北從中國本土加以分離，將它建設成為王道樂土，這種主張不僅與中野琥逸的思想雷同，也正是由「猶存社」、「行地社」的思想演變而來。^⑪

(二)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的風靡 流行於十九世紀歐洲的革命性社會主義，因俄國大革命的成功而影響了日本的思想界。所謂革命性社會主義係主張以激烈的

^⑨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下），頁 214。

^⑩ 同上書，頁 214-215。

^⑪ 同上書，頁 214-217。

暴力手段，用階級鬭爭的方法來實行社會主義，從而達到自由主義的最高境界。這種主義，被視為自由主義的左翼思想。這種新思潮的傳入，曾因社會運動或工人、農民等鬭爭的激烈化，造成日本社會的不安，加上第一次大戰後的經濟不景氣，終於在 1920 年使日本也嚐到經濟大恐慌的滋味，這是當時客觀的情勢所使然。

在這經濟大恐慌與社會不安的情勢之中，1922 年 7 月 15 日，由自由主義的左翼人士堺利彥、山川均、德田球一等創立日本共產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當局鑒於社會不安，爲了因應當時的潮流，早於 1922 年 3 月 24 日，眾議院即審議通過「過激社會運動取締法案」^⑫，可見日本政府正視的程度。同年 11 月，右翼人士米村嘉一郎等人組織「日本赤化防止團」，使思想方面左右兩派的對立，更形尖銳化。^⑬

不可否認，當時日本政府是壓制自由主義思想的，然而該思想依然成爲一股強大的洪流，強烈地震撼了學生的思想。在大正民主運動時期，推動自由主義思想的魁首應爲「黎明會」。該會是由以民主主義作爲共同理念的著名知識分子所組成的政治與社會的啟蒙團體，成立於 1918 年 12 月，創立當時的會員約有 23 名，其中今井嘉幸、新渡戶稻造、穗積重遠、朝永三十郎、大庭柯公、大山郁夫、渡邊鎮藏、吉野作造、高橋誠一郎、瀧田樗陰、左右田喜一郎、福田德三、麻生久、木村久一、森戶辰男、內藤民治等，皆爲當時學術界、文化界，思想新穎的人士，其中中心人物爲吉野作造與福田德三（東京高商畢業，爲經濟理論、經濟史、社會政策等開拓者）。^⑭黎明會的綱領三條，是由吉野與福田兩人共同擬訂的。如下：

1. 將日本的國體，用學理加以闡明，並在世界人文發展的過程中，發揮日本獨特的使命。

2. 消除不能順應世界情勢的危險頑冥思想。

3. 順應戰後世界新趨勢，促進國民生活的安定與充實。^⑮

1919 年 1 月 18 日，黎明會首次在東京神田青年會館舉行演講會，巧逢巴黎和會開幕。吉野在致開會辭時表示，黎明會的目的是想透過巴黎和會闡明參加「世界改造」的日本的主体性，同時要與不能順應世界局勢的頑冥思想鬭爭，並對解決日

^⑫ 歷史學研究會，日本史年表（東京，岩波書店，1969 年，五版），頁 266。

^⑬ 風間道太郎，尾崎秀實傳（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7 年，新裝補訂版第 2 版），頁 50。

^⑭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頁 30。

^⑮ 福田德三，黎明錄（東京，佐藤出版部，大正 8 年），頁 986。

本的社會問題做一些貢獻。^⑩總括地說，這個論點是一種超越日本民族主義而以人道觀念為基礎的國際主義、民本主義及社會政策的提倡。

黎明會將每個月一次的演講紀錄加以彙整成冊發行，名為「黎明講演集」，創刊於 1919 年 3 月 1 日，至同年 10 月，每月發行一次，1920 年 4 月 1 日，發行第 2 卷第 4 輯後即停刊。^⑪

1918 年 12 月，幾乎與黎明會創立同時，以培養高級文官的東京帝國大學產生一個名為「新人會」的革新團體。這個團體是由一羣有感於「大學那莊嚴的正門，雖然直通特權階級，但對於一般民眾卻緊緊地關閉著」，而認為「唯有把自己投入民眾之中，才能見到正義與真理」的東京帝大學生，在吉野作造及麻生久的指導與支援下成立的。^⑫創立當時主要成員有赤松克麿、宮崎龍介（宮崎滔天之子）、石渡春雄、平貞藏、三輪壽壯、嘉治隆一、林要等二十幾人。他們幾乎都是吉野作造教過的學生，而且都曾參與吉野指導下「普通選舉研究會」及東京帝大法學部「綠會辯論會」的成員。^⑬

吉野作造對中國問題有深入的研究，惟他在大正民主運動時期所扮演的角色，更為出色。他當時以鼓吹民主政治，提倡全民選舉，而被時人譽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他除在講壇講授民主主義，廣受學生歡迎外，還利用各種雜誌撰文鼓吹民本主義。眾所周知，當時民主主義、民本主義都被視為禁忌，尤其官僚階級及保守的軍國主義思想者，認為民本主義是異端，足以搖惑社會，而時加撻伐。如 1918 年秋天，吉野在「中央公論」以「排斥言論自由的社會壓迫」為題，責難黑龍會派系的右翼團體「浪人會」對大阪朝日新聞社社長施以暴力的事件，觸怒了浪人會，下帖吉野，要求辯論。

1918 年 11 月 23 日，辯論演講會在東京南明俱樂部舉行，參加的學生、勞工絡繹於途，盛況空前，最後雙方在形式上雖然互相承認對方立場，但此一舉動，不僅轟動在場人士，也使進步的知識階層興奮不已。以這個事件為契機，才使大正民主運動有神速的發展，應非誇大之詞。^⑭

新人會的綱領有二（由赤松克麿所擬）：

^⑩ 田中孝治編，黎明講演集，卷 1（東京，大鑑閣，大正 8 年），頁 1-6。

^⑪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頁 31。

^⑫ 新人會同窗會編，東京帝大新人會員の足跡（東京，創造書房，1987 年），頁 8。

^⑬ 松尾尊兌、森史子譯，新人會の研究——日本學生運動の源流（東京，東大出版會，1978 年，初版，原著為 Henry Dewitt Smith II, Japan's First Student Radicals.）頁 41-42。

^⑭ 同上書，頁 40-41。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東京，勁草書房，昭和 39 年，初版），頁 44-45。

●●● 民主の進歩と発展 ●●●

刊 月
イシラクモデ

行發日六月三 第一卷一第



本誌の趣旨は、民主主義の普及と、社会の進歩を期すに在り。其の爲め、政治、経済、教育、文化、科学、藝術等、あらゆる方面に於て、最新の情報と、鋭い批評とを供給する。其の爲め、読者の意見を歓迎し、之を本誌の発展に資するものとす。

定価 一部 拾圓

Democracy, No. 1, March 1919.

LA PIONIRO

驅先

號刊創

眞理を怖るるのみ 百利無一害
若き人の群よ 奮起せよ
カントと代等
夢遊遠東と新興文化
時評
労働問題と管理階級の問題
労働の組織と結核
性的衝動と結婚
智識取引の偽善
友愛會日立遊樂事件
村上花村を悼む
放浪のソシアリスト
血涙の後に

定価 一部 二十錢

Senku (The Pioneer), No. 1, February 1920.

行發會人新

胞同

號刊創

本誌の趣旨は、兄弟の愛と、社会の進歩を期すに在り。其の爲め、政治、経済、教育、文化、科学、藝術等、あらゆる方面に於て、最新の情報と、鋭い批評とを供給する。其の爲め、読者の意見を歓迎し、之を本誌の発展に資するものとす。

定価 一部 拾圓

Dōhō (Brothers), No. 1, October 1920.

行發會人新

●●● HAROD ●●●

ドオロナ

本誌の趣旨は、市民の手に、社会の進歩を期すに在り。其の爲め、政治、経済、教育、文化、科学、藝術等、あらゆる方面に於て、最新の情報と、鋭い批評とを供給する。其の爲め、読者の意見を歓迎し、之を本誌の発展に資するものとす。

定価 一部 拾圓

Narod, No. 1, July 1921.

上面圖片係取自 Henry Dewitt Smith II, "Japan's First Student Radica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 Press, 1972.

1. 我們將協調解放人類的世界文化趨勢的新時機，並致力於促進此一機運。
2. 我們將從事現代日本合理的改造運動。^②

從上面綱領不難看出，其內涵甚為籠統而言詞卻有很高的理想，這種趨勢，不是新人會所特有，而是當時所有知識分子及學生團體共同的特色。新人會創立之初，與黎明會一樣，沒有具體的運動目標，只是一種強烈的思想團體。不同的是，新人會主張「摒棄學校觀念，以純真的青年團體開放給社會各階層，以謀糾合同志」。^② 它不像黎明會採行會員制，而是與其他大學及勞工階級之間有活絡的交流，並透過此層關係踏進實際的運動。1919年2月，東京都下各大學學生為促進普選，在日比谷公園舉行示威運動，參加者約1000名，由新人會主導，是為該會對外參加運動之始。此後舉凡學生運動或勞工運動，新人會成員都熱衷參與，尤其到後來該會參與勞工運動的興趣甚於普選運動，其思想立場也由民主主義演變為工團主義（Syndicalism）或為馬克斯主義。這由其機關誌從創刊時的「デモクラシ Democracy」（1919年2月～12月），改稱「先驅」（1920年2月～1920年8月），再改稱「同胞」（1920年10月～1921年5月），最後改稱「ナロオド NAROD」（羣眾之意，由俄文演變而來，1921年7月～1922年4月），可以看出其思想轉變的情形。^③

當1919年2月，新人會發刊機關誌「デモクラシ」時，的確引起日本社會很大的反響，成為很重要的評論性刊物。眾所周知，當時日本幾乎沒有政治的自由，連「勞動」或「社會」等詞句，都不敢大聲討論，新人會決定以「デモクラシ」作為機關誌，實無異於叛逆行為。然而由於「デモクラシ」的發刊，新人會不僅成為東京帝大校園內的重要社團，甚至以讀者為中心在日本各地如京都、仙臺、岡山等地都成立支部，其活動也擴展到校外，已儼然成為日本全國民眾運動的重鎮。^④

繼東京帝大新人會以後，1919年2月，早稻田大學成立了名為「民人同盟會」的學生社會運動團體。該會是由受到高橋清吾、大山郁夫、北澤新次郎等早稻田大

^① 松尾尊兪、森史子譯，新人會の研究——日本學生運動の源流，頁47。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頁32。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47。

^② 法政大學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編，日本社會運動史料：新人會機關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昭和44年），頁16。原文引自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頁32。

^③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頁32。

^④ 新人會同窗會，東京帝大新人會員の足跡，頁8-9。

學出身之學者影響的學生爲中心而組成的。其中大山與北澤也是黎明會的會員，由此推論，民人同盟會與新人會一樣，跟黎明會深具淵源，當然其思想趨勢與黎明會、新人會必然類似。創立之初，主要成員有渥美鐵三、高津正道、和田巖、稻村隆一、淺沼稻次郎、三宅正一等。民人同盟會於1919年11月分裂，淺沼、三宅、和田、稻村等退出，另外在北澤新次郎的指導下新成立「建設者同盟」。1920年12月，民人同盟會因重要成員高津正道等受到退學處分而解散。建設者同盟則自1922年10月起發行機關誌「建設者」。建設者同盟傾向於關心農村問題，因此該社團培養不少農民運動的健將。^⑳

以上所介紹的是大正民主運動時期幾個比較典型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團體。其實自1919年以後，社會人士與學生均紛紛組織社團，費盡心力去演講或撰文，致力於自由主義的啟蒙活動。1919年前半期即出現不少新刊雜誌，尤其是有關社會主義等新思潮的出版品，影響力大爲增高。例如當時除原本就倡導自由主義頗有名氣的綜合雜誌「中央公論」外，1919年4月與6月，分別出現「改造」與「解放」等主張民眾解放運動與提倡社會主義運動的雜誌。^㉑早於1919年1月，京都大學教授河上肇創刊「社會問題研究」，並翻譯馬克斯的論著（其實在十九世紀末，馬克斯的論著，已有日譯本），影響學生的思想很大。同年2月，一羣抱持自由主義思想而遭受大阪朝日新聞解聘的記者也創刊「我等」雜誌，闡述自由主義思想。^㉒加上1919年2月新人會發刊的“Democracy”及1919年3月黎明會發刊的「黎明演講集」，可知當時日本各階層對於革命性社會主義或左翼自由思想熱衷的情形。

革命性社會主義在當時而言，是一種比較新穎的思想，不少學生受此衝擊而對它感到新奇與興趣。野間清（京都大學畢業，曾任職滿鐵調查部）曾經表示，大正時期日本知識分子幾乎都受到革命性社會主義的洗禮，很多大學畢業的學生，自高等學校（舊制）開始就閱讀馬克斯主義。^㉓有的學生甚至對革命性社會主義思想的追求達到瘋狂的程度。例如因德國人 Richard Sorge 間諜事件於1944年11月7

⑳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頁32-33。

㉑ 「改造」雜誌，起初主張民眾解放運動，後來刊載不少山川均、河上肇等有關於馬克斯主義的論文，引起日本政府的猜忌。1942年8月號，因刊載細川嘉六的論文被取締，發展成「橫濱事件」，1944年與中央公論社被勒令解散。角川日本史辭典，頁177。

㉒ 松尾尊兌、森史子譯，新人會の研究，頁54-55。

㉓ 野間清曾任職滿鐵調查部，1942年9月，第一次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時被檢舉。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頁134。

日被日本政府執行死刑的尾崎秀實，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尾崎於 1922 年 4 月考入東京帝大法學部，在 1924 年參加高等文官考試落榜以前，曾醉心於仕宦之途，是一位標準的愛國主義者，當時如火如荼的左翼運動，他認為是刺傷他國粹的感情。惟考試失敗後，改變了他的人生觀，完全放棄仕途之念，並經他的好友山崎謙（早稻田大學學生，受該校教師社會運動者及民本主義者大山郁夫的影響很大）之引介，開始涉獵有關馬克斯主義理論的書籍。尾崎進入東京帝大時也加入新人會，經常參加該會主辦的演講會，對於東京帝大經濟學部副教授大森義太郎主持的「布哈林（Bukharin）的史的唯物論」研究會，也邀約志同者熱心參與，使東京帝大畢業前與畢業後的尾崎判若兩人。^⑳也就因為他太熱衷於追求革命性社會主義理論，而認識 Agnes Smedley，再經她的引介，認識 Richard Sorge，而捲入間諜事件被判處死刑。

當時具有左翼自由主義思想的學生所追求的是思想的理論基礎，他們藉辯論與撰文啟蒙社會，他們認為他們的使命不在於擬訂改造社會的具體計畫，或成立強而有力的組織，而是在於散佈新思想。換言之，他們認為進步的大學生應走出象牙塔，傳佈改革的訊息給社會大眾。^㉑

1920 年代，日本學生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縱有街頭示威或參加勞工運動等轟轟烈烈的行爲，這只是少數，絕大多數都在校園內作鑽研活動。蓋社會主義在當時猶被視為禁忌，校外活動常受到監視與阻礙，而至少在 1928 年以前，校園是最安全的庇護場所。所以在二次大戰前，日本學生活動的主要舞臺不是在引人注目的街頭，而是在校園內。

前面已經提到，學生在校內吸收新思想，大部分是透過各種研究會，例如新人會或其他學校的社團，在表面上打出的招牌是研究社會科學，其中不無掩飾一點政治活動的意義。實際上，以研究社會主義思想而成立的讀書會或研究會，在戰前甚為普遍，而且很有組織化。讀書會或研究會成爲培養學生運動領導者的場所，同時也是學生採取行動的避風港。^㉒學生所組成的讀書會或研究會等團體，雖然規模不大，但對於新思想的傳播，功能是很大的。因為它們規模小，不易引起注意，也不易監視，因此能長久生存。他們的活動形式大致是每週定期集會，閱讀事先規定的

^⑳ 風間道太郎，尾崎秀實傳，頁 70-80。

^㉑ 松尾尊允、森史子譯，新人會の研究，頁 60-61。

^㉒ 學生社會科學連合會會報，第 3 號，1925 年 10 月 20 日，頁 4。

文獻後再行互相討論，這種研究會對學生而言，是自然的運動形態。對於厭倦枯燥乏味的填鴨式教育的學生而言，研究會可以順應他們追求新知的好奇心，訂定自己的讀書計畫，以滿足旺盛的讀書慾。因此，有志於改革的年輕人紛紛組織這種研究會，藉此討論新思想。大正民主運動時期，學生的左翼自由主義思想的種子，幾乎都是在校園內如此傳播的。

根據 1942 年及 1943 年在滿鐵調查部的兩次檢肅事件，被檢舉的 44 人中，依他們左翼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與環境的關係，有如下的統計：(1)在學中就已受到這種思想影響者為 27 人（大學畢業者 19 人，高等學校或專門學校畢業者 8 人），(2)進入滿鐵以後者 11 人，(3)其他 6 人。^⑳

依照比率，在學中就已抱持新思潮思想的占 60%，而在工作崗位受到影響的有 25%，兩者合起來為 85%，顯示校園或工作環境對一個人思想的影響是很大的，尤其如前面所提校園是傳播新思想的最佳場所，由上面的統計，更加可以印證。

三、調查部的自由氣息

大正民主運動時期，古典自由主義（主張調和個人與團體（社會）兩方面的利益，此派人士不反對社會主義，但反對激烈的革命手段，主張在憲政體制下逐步推動福利政策）及社會主義等新思潮，引進日本，造成日本學術界、教育界及學生等研究的熱潮，但日本政府並非採取放任態度，而是時加干涉取締的。日本政府為壓制一切反體制運動，於 1925 年制定「治安維持法」，禁止主張變更國體及否認私有財產制度的任何結社及運動，違者可以處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1928 年田中義一內閣時，將刑度擴大，增加死刑。1941 年加以修正，成為第二次大戰前，最嚴厲的治安立法。日本政府常藉此擴張權力及逮捕民眾，剝奪人民的思想、結社、運動的自由，因而被判刑的有好幾萬人。^㉑

「治安維持法」制定後之第二年（1926），首先遭受開刀的，就是以馬克斯主義為指導理論的日本全國學生社會科學連合會，這個彈壓事件叫做「學連事件」，亦稱「京都學連事件」。1926 年 12 月至 1927 年 4 月，曾在日本全國作大規模的搜捕行動，以治安維持法、違反出版法、不敬等罪名加以檢舉。因此次事件而被

^⑳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東京，極東研究所出版會，昭和 44 年），頁 87-88。

^㉑ 角川日本史辭典，頁 616。

起訴的學生有 38 名，京都大學、同志社大學教授如河上肇、山本宣治、河上丈太郎等的住宅亦受到搜索並被拘捕。文部省也因此次事件通令學校當局加強取締學生思想，並嚴禁學生研究社會科學。^⑳

1928 年，日本國內發生金融恐慌，又因第一次普選時共產政黨出現，勞農黨甚至推出候選人公然在活動，同年日本共產黨創刊「赤旗」，種種跡象使日本政府有芒刺在背之感。乃於 3 月 15 日大規模檢舉日本共產黨及共產青年同盟等左翼團體，被檢舉者達 16,000 餘名，其中以違反治安維持法被起訴者也有 484 名，史稱「3.15 事件」。^㉑同年 7 月，不僅內務省設置特別高等警察課，憲兵隊特別設置思想股，更爲了控制學生思想，文部省內也新設立學生課，在在顯示日本政府當局在積極地取締左翼甚至古典自由思想的人士。

1929 年，經濟大恐慌漫延至日本，景氣一落千丈，日政府又於 4 月 16 日，將共產黨員 339 名起訴，稱爲「4.16 事件」。^㉒日本共產黨經過這兩次事件的打擊，元氣大傷，遂更加深它的分裂。在前面一節中探討的東京帝大新人會，也因社會環境的變遷而於此年（1929）走上解體的命運。新人會的會員則在共青東大支部指導下，分屬到讀書會、無產者新聞讀者會、反帝同盟支部、赤色救援會支部等組織中進行活動。新人會於 1918 年 12 月要求普選而成立，至 1929 年 11 月 22 日發表「新人會解散聲明書」解體，^㉓共走了 11 年路程，對引進自由主義思想所作的貢獻，至今仍爲世人所稱道。

1930 年前後，日本的軍事行動，益形暴露，對於自由主義思想者乃一再的打壓，尤其是 1933 年，檢肅事件層出不窮。例如京都大學教授大塚金之助、河上肇以具有革新思想並付諸行動爲由，於 1933 年 1 月先後被檢舉，後者更被判處 5 年徒刑。又如 2 月 20 日，無產階級作家小林喜多二，11 月 28 日，共產主義理論家野呂榮太郎（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先後被檢舉。前者在東京築地警察署被槍殺，而後者於次年 2 月死於獄中。^㉔

1933 年 4 月，京都大學因罷免教授而發生不小的風潮。緣由是內務省以京都

^⑳ 同上書，頁 186。田中武夫，橋樸と佐藤大四郎（東京，龍溪書舍，1975 年，初版），頁 20。

^㉑ 角川日本史辭典，頁 414。歷史學會編，日本史年表（東京，岩波書店，1968 年，第 5 版），頁 272。

^㉒ 角川日本史辭典，頁 986。

^㉓ 新人會同窓會編，東京帝大新人會員の足跡，頁 27-28。

^㉔ 風間道太郎，尾崎秀實傳，頁 187。

大學教授瀧川幸辰的自由主義的刑法學說違反國體，嚴禁其論著「刑法講義」（1930年刊）、「刑法讀本」（1932年刊）發行，而文部大臣鳩山一郎更借題發揮，對京都大學校長小西秀直施加壓力，欲其解聘瀧川，引起該校法學部教授的抗議，然而瀧川最後還是受到停職處分。憤怒的法學部教授乃全體提出辭呈，學生也一致支持教授的決議，校長小西因認同文部省的處置而辭職，新任校長與文部省商議結果，接納了佐佐木惣一等5位教授的辭呈，其他獲得慰留。此次事件稱為「瀧川事件」，又稱「京大事件」。^③此後京都大學的學生運動經常受到警察的彈壓，該大學的自治也因此破滅。

由以上列舉的事例可知，日本政府因其軍事侵略行動愈明顯，壓制自由主義各派思想的知識分子就愈變本加厲。1932年2月9日，由極右派組成的血盟團射殺前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事件，^④與5月15日，陸海軍少壯軍官與愛鄉塾^⑤學生暗殺首相犬養毅事件（5.15事件）^⑥等，在在說明日本國內醞釀著一股迫切侵略大陸的勢力，想透過軍部獨裁政治來實現。

在極右派的血盟團員及少壯軍官橫行恐怖主義時，政府在軍部的運作下，對關連人物幾乎都從輕發落，倒是對自由主義者的取締彈壓雷厲風行，反映當時軍部勢力抬頭，日本政府已有無法控制之勢，使日本逐漸走向法西斯主義。

在日本國內的自由主義各派經「3.15」（1928年）及「4.16」（1929年）兩次事件後，其根基幾乎被摧毀，而九一八事變前後愛國主義及右翼思想的抬頭，使自由主義者更受到無情的打擊，他們因而轉入地下。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東北的特殊情勢及滿鐵調查部傳統的自由氣息，才讓他們找到發展的溫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爲了打開國內逐漸緊繃的經濟情勢，乃在日滿經濟圈的構想下，積極展開經濟建設，爲了樹立其統制化、計畫化等革新的經濟體制，必須引進具有較新穎的經濟知識與調查企劃能力的人士，如此就等於給予信奉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的社會主義思想人士參與的機會，滿鐵調查部卒成爲他們嚮往及達成理想的活動據點。^⑦

滿鐵調查部所以會形成濃厚的自由氣息，關鍵人物應該是佐野學與岡上守造。

^③ 同上書，頁187。角川日本史辭典，頁596。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年表，頁278。

^④ 日本史年表，頁276。

^⑤ 愛鄉塾爲橋孝三郎以農本主義爲基礎而設立的私塾，參與右翼運動，與血盟團及青年軍官共同組織農民敢死隊，5.15事件後，橋被判處無期徒刑，愛鄉塾也因而解散。角川日本史辭典，頁1。

^⑥ 角川日本史辭典，頁327。

^⑦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頁115-117。

他們兩個人皆畢業於東京大學，是新人會成員，在學中即熱衷於社會主義運動。自東京大學畢業後，即任職於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由於他們的牽線照顧，東京大學畢業的晚輩陸續進入滿鐵，尤其自 1920 年伊藤武雄、波多野鼎、田中九一（皆新人會成員）等人進入滿鐵以後，自由的氣息加上調查研究的自主性，更吸引了嚮往具有新思想的日本國內大學以及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畢業生。^④

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大量湧入滿鐵調查部，昇高它的自由氣息，實與 1939 年 4 月 1 日滿鐵調查部的改組（以後簡稱大調查部）大有關係。滿鐵調查部自 1907 年 3 月成立至 1939 年 4 月擴大為大調查部，當時所有調查機關的調查人員已增至 1,731 人，而至 1940 年 4 月，更增至 2,345 人，^⑤短短的一年之間，增加的人員超過 600 人，自非大量錄用新人不可。爲了因應當時日本國策與情勢需要，調查部當局所希望的調查人員的資格，是要具備能立即進行獨立調查與研究能力者。基於此，縱然是大學畢業或攻讀經濟學的畢業生，也無法立即勝任此項工作，乃採取「中間」徵募人才（即每學年度開始以後中途徵募），或請在職的調查人員介紹在日本國內的友人，或請大學教師推薦適當人選。因此，被推薦者之中不少具有「思想有經歷」的人，而他們卻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科學素養。調查部的高級階層也認爲只要有能力而且有確實的推薦者，對於是否「思想有經歷」並不太在意。^⑥反映當時調查部求才之切與那些所謂左翼人士的能力受到肯定，當然調查部的自由傳統與該部高層人士的開明作風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調查部改組擴大編制後，一如上述錄用很多左翼人士，其中如堀江邑一、岡崎次郎、伊藤好道（評論家）、山口正吾、藤原定、川崎巳三郎、平館利雄、具島兼三郎、石堂清倫、石田精一、藻谷小一郎、野野村一雄、安藤次郎、土岐強、佐藤洋、石川正義、鈴木重歲、西雅雄、細川嘉六（左翼理論家、日共參議員）、尾崎秀實、伊藤律（日共幹部）等先後分別加入大連總社，北京、上海事務所，東京支社的調查工作。他們之中有實踐家、有論壇人，皆爲活躍於社會運動的青年俊彥。左翼人士所以大量湧入滿鐵調查部，大致上不外三個原因：（一）日本國內取締彈壓愈來愈嚴，社會運動幾乎崩潰，想在東北求發展。（二）屢遭警方檢舉，雖然寫

^④ 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 48-49。安藤彦太郎，滿鐵——日本帝國主義と中國（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65 年，初版），頁 236。

^⑤ 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東京，亞紀書房，1982 年，初版），頁 10。

^⑥ 同上書，頁 10-11。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 218-219。

了「轉向書」(即悔過書)，卻仍不為警方信任，被視為危險分子，被驅逐到東北。

(三) 因參與社會運動，在日本國內找不到工作，乃轉而前往東北^{④7}。除此，他們幾乎都有很高的理想與抱負，因此充滿自由氣息而具開拓性的新天地，遂深深地吸引著他們。

的確，自由是滿鐵調查部的傳統，在日本國內必須處處小心的左翼經歷者，幾乎把調查部視為自由的樂園。他們到調查部後，就直覺那兒充滿自由氣息。例如在書刊方面，他們看到在「滿洲評論」或「滿鐵調查月報」上就堂堂刊載相當尖銳的左翼理論。而調查部的上司或同仁也勉勵他們盡量參加有關「資本論」的導讀會或 Wittfogel, Karl August 著「中國社會與經濟」的研究會，而且認為這是公司業務的一部分。像這種聚會，不但不會像過去一樣，被視為非法運動或秘密聚會而躲躲藏藏，還公然利用公司辦公室、會議室或調查人員的宿舍，作為聚會場所。^{④8}當然初次嚐到這種自由的空氣，除感到很新鮮外，而且會有落實之感。

滿鐵調查部內的社會主義思想者不斷地吸收新知，自不在話下，調查當局也不會太過於干涉他們所閱讀書籍的內容。調查部的工作特色就是「資料」與「步行」(意即田野調查)。新進人員在最初二年內的主要工作就是剪報與讀書。剪報工作熟練以後，往往上午就可以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下午以後就是讀書時間。他們想要看的書，在圖書館汗牛充棟。例如馬克斯、恩格斯全集，Bapra (1879~1964) 的「經濟年報」，列寧著作集、1927 年的論說等，在日本國內不但不能看，甚至連持有都有危險的書籍，在滿鐵調查部卻可以自由閱讀。如果圖書館沒有想要參考的書，只要申購，大致上都會得到同意。^{④9}

在滿鐵調查部工作過的人，有不少人曾撰文回憶當時的工作環境及吸收自由氣息的情形。其中具島兼三郎(九州帝大畢業，1937 年入滿鐵，1942 年被檢舉入獄，曾與前立法院長梁肅戎先生在長春同囚一室)曾如此回憶：「聽說海的那邊有自由，因此 1937 年就漂洋過海進入滿鐵，當時就感到滿鐵有想像不到的自由。日本國內自九一八事變後在瀰漫反動的風潮中，自由的空氣被一掃而空，而且在取締左翼思想的風暴之際，這裏卻可以光明正大地在談論馬克斯或列寧，這也許由於日本國內與大陸因地理上的區隔所形成的政治時差。事實上，因為滿鐵是『國策機

^{④7} 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 217。

^{④8} 山田豪一，滿鐵調査部——榮光と挫折の四十年(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昭和 53 年)，頁 129。

^{④9}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査部(上)，頁 105。

關』，其他地方不被允許的事情，這裏卻可以做到，是這種受寵氣氛下的產物。其次，社會主義者雖然左傾一點，但是他們比較能做事，調查部的高層幹部因而不太去挑剔，這種寬宏大量的態度，對於促成調查部的自由氣息，產生相當程度的效果。的確，那裏有意想不到的自由。」^④

田村羊三在「調查部觀」中更這樣說：「調查部是屬於滿鐵傘下的一個部門，事實上並不是這樣。雖然它是隸屬於滿鐵的，但也可以說不是滿鐵的。如果從滿鐵的『社則』或工作性質來看，它是一種治外法權的存在。這種奇特的現象，是靠滿鐵人的精神努力造成的。」^⑤

從上面兩位當事人的回憶，不難看出調查部的特徵與自由的程度。正當日本國內籠罩在法西斯主義的陰影之際，彼岸的所謂自由，其實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只不過是籠子裏的自由而已。但對一直渴望自由的他們而言，縱然這只是囿於籠子裏的自由，也感到無比的興奮與寶貴。他們盡情地寫作，盡情地高談闊論，也盡情地享受了自由。每位曾經任職於調查部的人士，每提到此段時光，皆眉飛色舞，津津樂道。而調查部甚至整個滿鐵，之所以允許社員進言與抗議，樂於採納下情，實與高層幹部的開明作風與工作人員的教育、思想背景及滿鐵本身的歷史定位大有關係。

四、調查部左翼團體的形成

滿鐵調查機關的設立是首任總裁後藤新平重要的殖民政策之一，他所以重視調查，是因為深信對帝國主義政策有利，而它也的確在這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調查部自 1907 年創立，因隸屬問題經幾次的改組，^⑥至 1939 年由第十四任總裁松岡洋右（任期 1935. 8. 2 ~ 1939. 3. 24）的構想，擴大組織，將調查機關歸於一統而成立大調查部，但其實就是由後藤肇劃的調查部發展而來。兩者的規模與調查方法，雖然隨著滿鐵在東北所扮演角色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但是其帝國主義的基本性格，則是不變的。換句話說，無論在偽滿成立的過程中，或在侵華的軍事行動上，它也助了一臂之力。關東軍曾反對日本的資本壟斷偽滿，並誇耀要將東北建設成王道樂土，其實所謂樂土，在關東軍控制下，反而成爲被統治民族眼中的軍事監獄。

^④ 具島兼三郎，どん底のたたかい—私の滿鐵時代（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80 年），頁 21-22。

^⑤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下），頁 142。

^⑥ 請參閱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東京，世界書院，1986 年，初版），頁 31-35。

關東軍所要達到的目的只是想將東北作為進兵大陸的巨大兵站基地而已。⁵³

1932年1月，滿鐵將調查課改組為經濟調查會，此舉非基於滿鐵經營策略所需，而是在關東軍想獨占滿蒙的計畫下強烈要求改組的。經濟調查會成立的首要目標在於謀滿蒙自身的經濟開發，扶植日滿經濟關係的合理化與日本的經濟勢力，擬訂滿蒙全體以及經濟各部門第一期經濟綜合建設計畫方案。換言之，關東軍的旨意在於使經濟調查會扮演關東軍的「經濟參謀本部」的角色。⁵⁴

為實踐上述計畫，必須要有不少研擬計畫方案的幹部，然而不管是關東軍或日本政府，並沒有培養這種人材。原來任職於滿鐵的調查人員也沒有受過這種訓練，他們雖具有如同「手藝人」的能力，然而他們是傳統而視野窄狹的經驗主義者，對於分析國民經濟整體的結構並不熟悉。因此縱然是稍具馬克斯主義經濟學知識的人，臨時也被派上用場。在戰時體制下，企劃院⁵⁵採用了幾名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者，⁵⁶也是在這種情形下所採取的權宜措施。

1932年大上末廣進入調查部（當時是經濟調查會時期），是為滿鐵左翼調查人員有組織活動的開始。大上以「講座派」理論作為指導理論，⁵⁷有組織地動員調查人員，進行滿洲經濟社會構造的調查。這種調查角度獲得絕大多數調查人員的支持，他們認為不根據馬克斯主義方法論所作的調查，不但不科學而且沒有價值，這種思潮不僅風靡當時的調查人員，甚至還對高層人士進言，希望完全接受與採納他們的理論及方法。

為了推展這種調查方法，加強同志的陣營，策動人事的安排，是為必然的手段。他們在調查部內設法取得領導權並積極參與部內的人事行政，利用業務上的方便，斡旋有意逃往國外的日本左翼思想者前來調查部任職，或拉攏新進人員，甚至

⁵³ 石堂清倫，「滿鐵調查部とマルクス主義」，運動史研究會編，運動史研究2（東京，三一書房，1978年），頁6。

⁵⁴ 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頁107。有關滿鐵經濟調查會的成立過程，請參閱陳豐祥，「滿鐵經濟調查會之成立及其影響」，歷史學報（國立臺灣師大歷史研究所歷史系，民國73年），期12，頁225-248。

⁵⁵ 企畫院創設於1937年10月，為促成統制戰時經濟的機關，直屬於內閣，1943年為新設的軍需省所吸收。企畫院是政府機關，而日本政府是不能容納馬克斯主義思想者的，然而在缺乏人才情況下，不得不採用這種人才。見角川日本歷史辭典，頁242。

⁵⁶ 石堂清倫，「滿鐵調查部とマルクス主義」，頁7。

⁵⁷ 講座派是昭和初年在日本資本主義論爭中與勞農派對立的一個學派，其主張於1932~1933年在野呂榮太郎指導下出版的「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而展開，並以此而取名。該派以擁護1927年及1932年日本共產黨的論說立場，分析日本資本主義，認為它是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及半農奴制的零星農耕，並強調日本的社會具有半封建的性格。見角川日本史辭典，頁333。

有時會排擠非馬克斯主義的右翼人士。不僅如此，他們也經常與調查部以外的左翼人士取得密切連繫，形成勢力頗為堅強的左翼團體。然而滿鐵調查部的左翼人士，又分為兩個派別，一為「經調派」，另一為「資料課派」。前者大部分是屬於剛從學校畢業沒有嚐試過挫折失敗滋味，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新進馬克斯主義者，後者則多屬在日本遭受取締而逃往東北的所謂「經歷派」人士。茲探討如下：

(一)經調派 該派的形成，緣於大上末廣於 1932 年進入滿鐵經濟調查會第一部滿洲經濟班為嚆矢。大上末廣(1903~1944)與調查部結緣是這樣的：他於 1929 年自京都大學經濟學部畢業後，進入該校大學院(研究所)，旋以大學院留學生身分派赴東北，1932 年旅居上海時，適逢上海 1.28 事件，他避難至大連投靠天野元之助(滿鐵經濟調查會第一部滿洲經濟班主任)，因為天野是大上在京都大學的學長，又曾受京都大學教授作田莊一(大上的指導教授，曾任偽滿建國大學校長)之囑咐予以照顧，乃經天野推介，進入該調查會隸屬於天野的滿洲經濟班，以「囑託」(特約人員)身分參與調查工作。他在京都大學時代雖然受到作田莊一的指導，然而他的學術路線比較接近河上肇(1879~1946，為馬克斯主義經濟學者)。他在學生時代並沒有參加社會運動，只致力於馬克斯主義理論的研究。因此他在滿鐵經濟調查會內，不論是企劃立案能力或領導能力或馬克斯主義的知識，都非常出色。在他領導下的團體，很快就超越其他前輩職員，成為經濟調查會的重心，他自己則被譽稱為「青年將校」。⁵⁸也由於大上的進入滿鐵，使得滿鐵在社會科學的研究風氣大為升高，這種新的風氣，對日後滿鐵的整個調查活動影響很大。

當時在滿洲經濟調查班工作的除大上末廣外，尚有渡邊雄二、野間清、井上照丸、石田七郎、小泉吉雄(後來皆被檢舉)等基層幹部。他們除參與滿洲經濟調查外，並計畫編輯滿洲經濟年報，而經調派之所以形成一股主導調查的勢力，實與編輯滿洲經濟年報有關。

1932 年下半年，經濟調查會第一部主任宮崎正義計畫編輯滿洲經濟年報時，以天野元之助之大力推薦，大上一開始就負起全部的編輯工作，而且主題及撰寫者的選定亦由他一手包辦。⁵⁹1933 年滿洲經濟年報發刊，由於當時他們的理論尚未成熟，而且執筆者尚有左翼以外的人士，所以該派尚未成為氣候。然而次年 9 月，

⁵⁸ 山本秀夫，橋樸(東京，中央公論社，昭和 52 年，初版)，頁 217。石堂清倫，「滿鐵調查部とマルクス主義」，頁 8。

⁵⁹ 田中武夫，橋樸と佐藤大四郎，頁 56。

1934 年度的年報出版時，執筆者幾乎都是左翼人士，且都以日本的「講座派」作為理論基礎來分析東北的社會經濟。在他們的共同意識與共同呈現的成果下，經調派的雛形已逐漸出現，及至 1935 年度的年報出刊，他們的集結勢力愈為堅強，所以有人把經調派又稱為「年報派」。^⑩

1935年秋天，經調派又奉關東軍參謀部命令參與東北經濟建設五年計畫的策劃工作。在策劃的過程中，經濟調查會內的左翼勢力更為擴大鞏固。1936 年 10 月，經濟調查會改組為產業部，下設業務股掌管調查業務及人事，主任由大上末廣出任，他即利用職務之便盡量安插同派人士，如和田耕作、山中四郎等京都大學校友加入，即是一例。^⑪經過大上的部署，在調查部內的左翼化體制，至此大致上已完成。雖然 1939 年 9 月，因經調派龍頭大上末廣及主要幹部和田耕作及土井章等相繼轉至東亞研究所，致陣容一時受挫，然而隨著經調派的大將如松岡瑞雄、稻葉四郎等又重整旗鼓，把持調查部的綜合課，利用此機會控制整個調查機關，其勢力又達到巔峰。

對於經調派勢力之大，熊谷康（1933 年拓殖大學畢業後任職日本駐華大使館，後經伊藤武雄介紹入調查部）曾作了回憶。他說：「一進去調查部就感到理論派集團君臨在那兒，自己暗中有在想，如果不搞馬克斯主義理論，可能無法晉升。」另一位熊谷的好友刈谷久太郎，也常受到其資料室的上司大塚令三的指摘：「你就是沒有理論觀念，所以不行，調查必須要有遠大的眼光。」^⑫因為經調派重視理論，而且關係到升遷，使得一些大學畢業後就直接進入滿鐵的菁英倍感壓力。

總之，經調派的成員，因有共同的理念，同時也受到講座派代表人物山田盛太郎（著有「日本資本主義分析」）的影響很大。他們以大上末廣為首，在共同編輯滿洲經濟年報的過程中，不論在所持立場或友情上，都具有強烈的派系意識，經調派就是在這種主觀的因素下自然凝聚而成的。

（二）資料課派 該派是 1935 年日本國內取締左翼人士雷厲風行之際，由鈴木小兵衛、枝吉勇、平井鎮夫、武藤繁、山口辰六郎、中西功、橫川次郎等左翼人士相繼前往滿鐵而形成的團體。上述經調派的大本營在經濟調查會及改組後的產業部業務股，而資料課派人士則盤據於滿鐵另一調查系統資料課（1932. 12 設立）內，因

^⑩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頁 176-177。

^⑪ 同上書，頁 177。

^⑫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頁 132-133。

此而得名。經調派人士大部分是大學畢業後經正常程序錄用的，資料課派則是因特殊情形而中途錄用的。在潛意識中他們認為自己是被驅逐的社會主義者，因此互相扶持、安慰，他們並經常回憶過去參與社會運動的種種，以保持社會主義等新思潮的意識，在「敗走的武士」會名下，互相珍惜友情，以加強團結。他們在滿鐵調查部自由的氣息中，過著落實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可知，這派人士的性格較為穩健，在各種活動的表現也比較溫和。他們與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經調派人士的見解與作為，畢竟有些差異，此為導致日後兩派發生論戰的原因所在。^③

該派形成之初，除鈴木小兵衛、中西功對經調派主張的「滿洲農業封建絕對論」的指導理論，持反對立場並撰文於滿鐵調查月報、滿洲評論等辯論外，在實際的左翼活動上並無特別的表現。^④尤其 1937 年秋天，由於資料課的大將如枝吉勇調至華北事務局，橫川次郎調北滿經濟調查室，鈴木小兵衛調長春分社業務課，資料課派羣龍無首，勢力更是大減，直到次年夏天以後，石堂清倫入滿鐵擔任滿鐵調查月報編輯，橫川次郎再回大連，出掌資料課，此外，新庄憲光、石田精一、臼井行幸、具島兼三郎、平館利雄、川崎巳三郎、佐藤洋、野野村一雄、尾崎庄太郎、安齊庫治等相繼進入滿鐵，聲勢才再壯大。他們以鈴木小兵衛、石堂清倫、川崎巳三郎、中西功等為首，維繫彼此感情與團結。1939 年調查部擴大改組，資料課派的活動範圍也因而擴大，同時也參與改組等問題，透過此一活動，該派逐漸取得在調查部發言的機會。

1939 年 4 月調查部擴大改組，下設綜合課，資料課系的具島兼三郎、臼井行幸、山口辰六郎等同時進入該課，惟當時調查部的勢力仍然掌握在經調派的大將渡邊雄二及野間清（先後任綜合課主任）手中，1940 年 1 月，鈴木小兵衛所構想的加強第一調查室陣容策略，即因經調派操縱綜合課而受到阻礙。

資料課派勢力的抬頭，應該在 1940 年 4 月，橫川次郎出任綜合課第三股主任，掌握業務上的領導權以後，此時該派的權力急速上升，及至野間清等經調派大將離開滿鐵（野間離開滿鐵後，轉任汪精衛政權中央儲備銀行顧問），資料課的勢力始得與經調派勢均力敵，甚至其領導權還凌駕經調派，對整個調查機關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前面已經提過，資料課派的活動不像經調派一樣轟轟烈烈，他們以溫和紮實的

^③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頁 178-179。

^④ 同上書，頁 179。山田豪一，滿鐵調查部——榮光と挫折の四十年，頁 139。

態度作實地調查與研究，如關於國策調查方面，他們不直接參與立案，僅提供決定國策的參考資料而已，然而由於他們勤於調查研究及撰文，所以成果是很豐碩的。⁶⁵

資料課派多穩健持重之士，他們對經調派只重理論的態度，皆表示異議。例如鈴木小兵衛就曾對大上末廣的理論，提出強烈的批評。鈴木認為大上的調查，連一步路都不走，而且更指出大上所運用的「講座派」理論（視日本社會為半封建社會，大上將此理論搬到東北，認為東北的經濟亦具有封建的性格，須以社會主義的理論來克服），無法說明與解決業已摻有資本主義色彩的中國農村，因此，認為大上的理論不具實證性，是一種非現實理論。石堂清倫也曾作過類似的批判。⁶⁶

大上等經調派人士，開口閉口就對為了尋找資料奉獻了寶貴青春去作實地調查的人士說，你們沒有理論，不懂方法論。事實上這批重視實地調查的人士如清水盛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天野元之助（滿鐵經濟調查會第一部主任）、天海謙三郎（資深調查員，參與滿洲舊慣調查）、野間清（京都大學畢業，雖屬經調派，但作過不少實地調查）、室賀定信等均認為，如果不從清朝時代的舊慣開始調查，實在無從了解中國的農村社會及家族構造等。他們在調查部內設有特別調查室，以兼顧史實與近代理論的方式進行研究。清水曾撰寫一部名著「支那家族的構造」，而室賀也完成一部被學術界肯定的「滿洲經濟史」。⁶⁷

前面曾經提過的熊谷康，也對經調派的方法有所評論：馬克斯主義如同分解時鐘，他們想藉此來說明零件的數目及其互動關係，以為這樣就可以闡明時鐘的真相。然而他們忘了時鐘一經分解就會停下來。其實最重要的是應該把事業用動態的方式來分析。⁶⁸

經調派以外的人士，並不是沒有方法論，他們也讀過馬克斯等社會主義理論，而大上等一派人士雖然重視理論，但是在他們自己擬定的計畫下所作的調查，最後還是脫不了運用調查部舊的傳統方法。其實，滿鐵調查部豐碩的調查成果，是融合兩派人士的理念而逐一完成的。

⁶⁵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頁 180-181。

⁶⁶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上），頁 136。石堂清倫，わが異端の昭和史（東京，勁草書房，1987年），頁 217-218。

⁶⁷ 草柳大藏，前引書（上），頁 137。

⁶⁸ 同上書，頁 137。

五、調查部擴大組織與軍方情結

滿鐵重視調查活動，是始於首任總裁後藤新平，他以經營事業的長遠眼光，強調調查活動必須建立在嚴密的科學基礎上，他在任內所設置的調查機關如調查部（1907年3月設）、東亞經濟調查局（1908年2月設）等無一不是基於這個原則。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調查部雖因隸屬問題而名稱及職權屢有改變，但其基本精神乃是秉持創立初衷，尤其是調查人員均能堅守崗位，獨立研究調查，甚少受到外界干涉。所以他們的研究調查成果，是具有客觀性與學術性的。

然而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由於關東軍之從中干預，調查機關在無形中逐漸變質。1932年7月1日，將調查課（1908年12月調查部改稱調查課，後來有時隸屬於總務部或社長室或庶務部）改組為經濟調查會（直隸滿鐵總裁），即是在關東軍強求之下成立的。滿鐵的調查活動自此須與軍方配合而受軍方牽制，漸漸失去它昔日的獨立自主性。

眾所周知，九一八事變以後關東軍勢力膨脹，滿鐵在東北經營事業，經常受到關東軍的掣肘，自不在話下，1935年12月，更在關東軍的策劃下成立興中公司。關東軍策劃此公司的目的為透過它直接經營事業。然而由於日本國內反對聲浪高，因此乃將興中公司的事業範圍，設限於東北、華北、華中之貿易及金融活動。⁶⁹ 隨著1937年七七事變之發生及戰事之擴大，興中公司的經營管理範圍，也日益擴展，這一連串的變數，使滿鐵在東北經營的相關事業，被關東軍排除蠶食，其功能也逐漸受到限制。換言之，滿鐵不僅被排除參與經營滿鐵以外的事業，連參加中國本土企業的機會都無從獲得。在這種處境下，當然引起滿鐵相當不滿，為了安撫這種不滿情緒，當時的總裁松岡洋右乃於1939年4月宣佈調查部擴大實施計畫案，並且聘請滿鐵創設時即擔任理事的田中清次郎出掌調查部，籌劃擴大組織事宜。調查部的擴大組織計畫，可以說是松岡洋右為滿鐵的不滿情緒而提出的因應對策。

調查部擴大組織，除上述原因外，因應時局需要與配合國策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早在1938年7月，產業部改編為調查部時，首相近衛文麿曾經主張日、「滿」、「支」應結合為一體，他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中，強調「透過日滿支集團，增加物資的供給量，以謀經濟的安定，並以此為基礎擴大戰力」為政策

⁶⁹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東京，勁草書房，1984年，初版），頁384。

的重點。^⑩而松岡洋右在「滿鐵調查機關擴充理由書」中，也言明「以嚴密客觀的調查研究，作為樹立政策的正確基礎」，^⑪不難看出松岡的調查部擴大組織計畫，是配合日本政府政策的。依據松岡的構想，是要將調查部變成「在大陸上含蓋政治、經濟、軍事等三方面的參謀本部」，^⑫期使已漸消沉的調查活動活潑化。當時的輿論，對於擴大組織後的調查部也寄以厚望，他們都以日本國策的立場，認為調查部在日本政府擬定大陸政策時，可以發揮相當程度的功能。在調查部擴大組織的雛型逐漸成熟時，東京朝日新聞以「滿鐵調查部與東亞研究」為題的社論上（1939. 2. 5）評稱，調查部擴大組織為「因應時局的需要」，社論提到對於調查活動的期待時，認為「事變（七七）發生以來，滿鐵調查部提供不少值得信賴的調查資料，這是被公平的、有識之士所肯定的，具備信用與經驗基礎的調查部，對於國策一定會有相當的貢獻。」^⑬

1939年4月以後的調查部已與鐵路、炭礦，儼然成為滿鐵的三大事業部門，而調查部也真正擔荷了調查研究東北、「中國」、蘇聯及東亞各地政治經濟社會等重任，當然其龐大的調查資料，也引起各界的關注與評價。這個時期的調查活動，擬定了(一)國策性與客觀性，(二)調查的實地性，(三)調查的綜合性等三種目標，^⑭尤其特別強調調查部整體組織的「有機的一體的」運用與「綜合調查」的必要性，^⑮而後者成為日後調查的重要方針。

中日戰爭日益擴大以後，關東軍參謀部對調查的活動極為關心，不僅肯定其調查能力，而且還希望調查活動能與軍方配合。1939年1月12日，關東軍參謀部向滿鐵表示(一)不希望調查部被利用在政治活動上，須留意該部的活動，(二)調查重點須放在東北及蘇聯（尤其是西伯利亞），特別為因應該地區作戰需求的現地調查為急務，(三)隨著滿鐵總社業務的變動，盡速將調查部的據點設置於長春，(四)調查活動須密切與軍部配合，將來軍部如有要求，當隨時指示。^⑯

由上可知，關東軍參謀部是要求將調查重點放在東北及為對蘇作戰而準備，至於對調查部組織的營運，則沒有作過分的要求，因此，當時調查部綜合課或高階層

^⑩ 滿鐵弘報課，滿鐵と調査，1940年度，頁50。

^⑪ 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180。

^⑫ 滿鐵弘報課，滿鐵と調査，頁49。

^⑬ 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189。

^⑭ 鐵滿會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四次十年史(東京，龍溪書舍，昭和61年，初版)，頁476-477。

^⑮ 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31。

^⑯ 同上書，頁26-27。

人士，對於關東軍的「表示」，並沒有特別放在心上。1941年1月17日，關東軍參謀長木村兵太郎正式呈遞「有關滿鐵調查部的營運要求」的說帖給滿鐵總裁大村卓一，內容雖與1939年1月的要求大同小異，但一再強調(一)調查部組織的營運，應將重點放在東北，(二)調查重點應集中在社業(公司業務)及為對蘇作戰而準備的調查上，(三)調查部組織的整體營運應受關東軍指導，至於各地的調查組織，則受各該地區的軍事機關的指導，(四)調查部本部應遷至長春。⁷⁷

關東軍所以會有如此強烈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於時局已日趨緊張，另一方面則因該擴大組織後的調查部，已漸恢復自主性，較難駕御。當時，日本的經濟，因中日戰爭的長期性，與日、德、義三國同盟的締結，使日本被以英美為中心的世界經濟圈加以孤立，導致日本無論在資源或市場構造上的弱點及矛盾，暴露出來。連日本陸軍部內部也出現所謂「占領態勢」的收縮論，其次，閣議上也在醞釀是否應從中國大陸全面撤兵。⁷⁸在這種政治、經濟等矛盾激烈惡化之下，關東軍自然想把滿鐵調查部納入控制，讓調查部再度發揮如經濟調查會時期的功能，渡過難關；一方面也期望動員調查部組織主力，作為對蘇作戰的準備。

雖然如此，調查部擴大組織後，因將主力全神貫注於推行綜合調查計畫，而這些綜合調查，不僅顯示調查人員對日本的大陸政策採取批判的態度(將在後面分析)，而且對軍部委託的調查事宜，常常被以附帶事情來處理，致使軍部相當不悅，也為1942年及1943年的檢肅事件，埋下了伏筆。

調查部與關東軍之間的芥蒂，緣於前者傳統的自主性與後者意圖控制調查活動引起的矛盾。但這並不意味調查部與軍方絕對水火不容，無法合作。事實上，當時日本的國內外情勢在軍部的主控之下，身為現地調查機關亦即「國策的調查機關」的滿鐵調查部，沒有理由完全拒絕軍部所委託的調查事宜。相對的，如果想作現地調查，或者想獲得基本的文獻或資料，如果得不到軍方的承諾與援助，也是行不通的。因此，無論是調查部極力推行的綜合調查或者其主動企畫的其他調查活動，平常在實施之前，必須先知會關東軍及各該地的軍事機關，說明主旨，得到承諾後，始以接受軍方委託調查的方式進行。調查部及各地調查機關在這種情形下，很難拒絕軍方的委託調查，甚至不得不經常與軍事機關取得密切的連繫。⁷⁹

⁷⁷ 同上書，頁193-201。

⁷⁸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部，戰史叢書——大本營陸軍部2(東京，朝雲新聞社，昭和44年)，頁36。

⁷⁹ 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29。

調查部是日本在東北甚至在中國大陸代理其政府經營殖民事業的機關的一個部門，因此調查部在本質上就有濃厚的殖民色彩。調查人員在這方面的意識，在程度上雖有濃淡之別，但抱著以「奉獻與順應國策」為使命的人，仍居多數。尤其自經濟調查會以後，這種傾向已逐漸定型。如前所言，雖然調查部有其傳統的自主性，卻常常身不由己，來自軍部的委託調查，接踵而至。就以較重要的事例而言，如海軍省委託的「東亞的主要物資自給力調查」，調查部第三調查室的對蘇情勢調查，第四調查室的礦床、地質調查，大同煤礦調查，黃河調查，大興安嶺調查，熱河省境地帶調查，華中華南兵要地調查，華南地區的軍事機關管理工場的實地調查，華北地區的西北線路調查，山西資源調查，日滿支勞動力實地調查等，無一不是應軍方要求而作的。除此，東北、華北、華中各城市的陸軍特務機關或宣撫工作班，也常要求調查部派員支援。太平洋戰爭末期，也曾應軍部要求，派遣調查團前往海南島及日軍佔領下的南洋各地，作與軍事有關的各種調查。^⑩

上面所列舉的事例，正顯示當時調查部的基本方針所在。然而在調查部內部，卻有持不同意見的一派人士，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操控著調查工作。他們並不是有意要打壓調查部的基本方針，他們所主張的是堅持調查與研究的科學性，反對為追隨國策而調查，甚至主張將國策本身也應作為科學分析的對象。在他們的潛意識中，雖然沒有很明確或者正面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但是期望早日結束對華戰爭的意願，卻為大多數人的心聲。因此，他們在調查的過程中，以資料作客觀的分析時，難免會提出令軍方不悅或與軍方旨意背道而馳的報告。在軍方主控一切的戰時體制下，對這些人採取不利行動，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

六、檢肅事件的發生及其意義

1941年，由於日本政治情勢逐漸惡化，對於思想的控制，愈來愈嚴。1941年至1942年，在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發生前夕，日本國內即發生幾件如(1)限制東京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等六名學者及評論家，撰文批評時政，^⑪(2)企畫院事件，

^⑩ 同上書，頁 30。

^⑪ 矢內原忠雄，東京大學畢業，為著名的經濟學者，著有「殖民及殖民政策」、「人口問題」、「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滿洲問題」、「帝國主義下の印度」等書，將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以實證的方式加以探討。他因撰文批判軍部的戰爭政策，受到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國家主義教授土方成美等抨擊，認為矢內原的思想不當，要求他辭職，同時文部大臣也對東京大學校長長與又郎施壓力，矢內原終於辭職。戰後回東京大學任教，歷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教養學部部長，1951年任東京大學校長。參閱角川日本史辭典，頁 956。

◎(3)治安維持法の修正，◎(4)横濱事件◎等比較著名的彈壓學術文化界的事件。使得日本全國各地瀰漫著緊張的空氣，人心惶惶，不可終日。而一向秉持研究與調查自由與自主性的滿鐵調查部，對於來自軍部的壓力，也感到愈來愈大。

滿鐵調查部所秉持的建立於科學基礎上的調查與研究的自主性，在某種角度而言，就是對侵略政策的一種挑戰。他們的調查成果，難免會對體制作些批判，或對一味想擴大戰事的軍部，有不利的言論。因此，軍部頻施壓力，伺機反彈是必然的。太平洋戰爭發生前後，調查部所作的調查中，批評日本政府與軍部的言論，不勝枚舉。其中有幾項言論及調查報告，都以客觀的態度加以分析，咸認局勢對日本不利，建議日本對世界大勢及本國當前情勢，不可太樂觀，對華戰爭也應早日以政治方式解決。這一連串不利於作戰的言論，觸怒了軍部，實為導致軍部採取檢肅行動的重要因素。茲擇要探討如下：

(一)具島謙三郎的言論 具島謙三郎（任職調查部北方調查室）曾以「物資戰略與外交政策」為題，闡述他對日德義三國軍事同盟的看法。他曾調查各國在總體戰時，所存重要戰略物資的情形，所得的結論是，如果日德義三國要與英美法中國及其他各國決戰，以物資而言，前者遠不如後者。如果以純軍事立場加入軸心國，對日本非常不利，而且非常危險，因此極力反對日本加入軸心國。◎這種言論，在當時是很大膽的，如果刊載於日本國內的一般評論性雜誌上，將會發生嚴重後果（該文發表於「滿鐵調查月報」，1939年10月號及1940年1月號）。然而，調查部長田中清次郎閱讀後甚為感動，乃派遣具島前往東京參謀本部，賦予向參謀本部各參謀具體說明參加三國同盟不利之任務。結果如何，不難想像。

1939年9月，自德國入侵波蘭以後，以破竹之勢，席捲歐洲。1941年6月，

◎ 企畫院是1937年10月第一次近衛內閣將原來的企畫廳及資源局加以合併而成立，直屬於內閣，為中日戰爭至太平洋戰爭期間，統制戰時經濟的機關。企畫院事件是緣於該院調查官和田博雄、稻葉秀三、勝間田清一、佐多忠隆等17人於1941年4月，以違反治安維持法被檢舉，罪名是他們想達成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戰後無罪釋放。參閱角川日本史辭典，頁242。

◎ 治安維持法制定於1925年，以後經幾次修正，至1941年修正時，加上預防拘禁制，擴大解釋範圍，剝奪人民思想、結社、運動等自由。參閱上書，頁616。

◎ 太平洋戰爭期間，由神奈川縣特高警察一手扮演的一連串的言論彈壓事件（1942~1944年）。在此事件中，被檢舉的有細川嘉六（經濟學者）、相川博（任職改造社）、木村亨、淺石晴世（均任職中央公論社）等7人。受到這個牽連，1944年至1945年，又將與中央公論社、改造社、日本評論社、岩波書店等有關係的30餘人，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罪嫌起訴，其中3人因受嚴厲拷問死亡，其餘，至戰爭結束一直沒有判決。「中央公論」與「改造」兩種雜誌，於1944年7月被迫停刊。參閱上書，頁977-978。

◎ 具島兼三郎，どん底のたたかい—わたしの滿鐵時代，頁24-25。石堂清倫，わが異端の昭和史，頁222-223。

德軍攻入蘇俄境內，日本也呼應德軍，作對蘇作戰的準備，因此大本營發動關東軍舉行特別演習，在東北部署七十萬大軍。此時，具島又被滿鐵當局傳喚，要他對德蘇戰爭表示意見。他曾頻頻被問到蘇俄何時崩潰，因為滿鐵首腦在德軍閃電攻擊，屢奏捷報中，幾乎都深信蘇俄必敗。但具島卻表示，德軍石油補給困難，如果不占領高加索地區的油田，則無法獲得最後勝利。但紅軍的裝備與士氣遠較法軍為佳，因此紅軍在高加索的防衛，將非常鞏固。他甚至堅定地表示，德蘇戰爭無法在兩個月結束，應該是長期戰爭。⁸⁶由這件事可以證明，滿鐵首腦部與調查人員之間的情報是有出入的。

1941 年底，具島又被參謀本部傳喚，提出相同問題要他表示意見，作為 1942 年度的作戰資料。具島的分析，依然與在滿鐵當局所表示的意見大致相同。⁸⁷具島的言論，被軍部認為「敗戰」思想，列入黑名單，最後換來的是牢獄之災。

(二)「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⁸⁸ 支那抗戰力調查是由滿鐵調查部上海事務所（當時的所長為伊藤武雄）於 1939 年 7 月成立的「支那抗戰力調查會」為主而完成的，貢獻最大而且實際指導的是中西功（1942 年 6 月，以反戰及中國共產黨諜報團罪嫌，被檢舉）。參與者除中西功外，尚有尾崎秀實（東京支社）、具島兼三郎（大連本社）、三輪武（上海事務所）等，皆為一時之俊彥。此次調查是調查部擴大組織後，所標榜的「綜合調查」的代表作之一，評價很高，被認為是當時分析抗戰期間中國情勢最卓越的調查報告。⁸⁹該報告從中國的政治、戰時經濟政策、奧地（即內陸）經濟、外援等廣泛而深入地分析中國情勢，認為中國的抗戰，是關係民族的獨立與發展的全民抗戰，其抗戰力強韌而堅定，並確信抗日戰爭一定會成功。因該報告的篇幅很大，無法一一指出其要點，如果將這個報告作一個總結，其要旨大致上是這樣的：

一個高度資本主義化國家的社會，一旦失去經濟的重要據點，這個社會將因此而癱瘓，然而像中國這種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則未必會如此。因為縱使中國沿岸地區資本主義發達，全國經濟未必就被納入其中，廣大的農村，實際上與沿岸地區的資本主義並無太大關係。沿岸地區縱然讓日軍占領，仍然可以生存下去。尤其

⁸⁶ 具島兼三郎，前引書，頁 41-43。

⁸⁷ 同上書，頁 44-47。

⁸⁸ 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由東京三一書房於 1970 年出版，共 582 頁，內容分為總結、政治、戰時經濟政策、奧地經濟、外援等五編，資料豐富，內容詳細。

⁸⁹ 宮西義雄，滿鐵調查部と尾崎秀實（東京，亞紀書房，1983 年，初版），頁 56。

是中國的農村社會，在七七事變之後，不論在生產方式或農民合作方面，已有顯著的進步，生產力因此而增加，農民在政治上的發言漸受到重視，使向來受地主支配的中國農村社會，產生很明顯的矛盾，已逐漸釀成用政治革命的手段來解決，因而政治結構也在改變。另外中國正致力於脫離列強的控制，為統一民族國家的形成而戰。該報告並進一步分析，從兵站線的角度而言，日本無法進攻到中國內陸，日本軍能夠進攻的只是一定的線而已。如此，這個戰爭將成為長期性的戰爭，如果不用政治方式解決，光憑軍事解決是不可能的。⁹⁰

這個報告完成之後，曾受到軍部的重視，認為是很寶貴的資料，乃將參與調查的人員，分批以飛機載送至各地，如東京政府各部門及參謀本部，駐華各軍事機關，如關東軍司令部、駐華日軍總司令部、華北軍司令部、海軍駐華艦隊幕僚部、上海陸軍特務機關等，作一次至三次不等的巡迴報告。⁹¹當然他們在巡迴報告時，仍然強調中國抗戰力之不可忽略，在採行政治解決之過程中，必要時，亦可從中國撤兵。這種認識與思考，不僅得到滿鐵調查部的認同，也逐漸得到日本國內有識之士的共識。但是隨著日軍敗相漸漸暴露，軍部的態度，隨之有很大的變化。上述調查結果，似與他們的好戰心態背道而馳，自然會藉機對調查人員反彈；將他們戴上共產主義的帽子，認為這是含有濃厚左翼色彩的調查報告，是「敗戰」的言論，⁹²這就是軍部檢舉調查人員最好的藉口。

(三)「日滿支通貨膨脹調查報告」與「戰時經濟調查報告」「日滿支通貨膨脹調查報告」為1940年度調查部的綜合調查成果之一。⁹³此項調查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在於制定日本、東北，以及「支那」通貨膨脹的因應對策，試圖從各地區的通貨膨脹歷史及實際狀況，找出使通貨膨脹惡化的因素，提出一套抑制之策。然而報告中卻指出，目前的東北經濟構造，日本似乎有將國內的經濟矛盾現象與負擔轉嫁到東北的趨勢，這樣東北就無法建立重工業，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1)消除地主及中間階層在農村的榨取，提高農民生活水準並開放東北本身的勞動力，(2)東北的重工業不但沒有因鮎川等日本資本的引進而成長，反而有百般榨取東北的現象。他們

⁹⁰ 參閱滿鐵調查部編，支那抗戰力調查報告（東京，三一書房，1970年），頁1-582。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219-221。具島兼三郎，どん底のたたかい，頁28-32。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400。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頁195。

⁹¹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頁195-196。

⁹² 同上書，頁184。

⁹³ 日滿支通貨膨脹調查經過及報告全文，收錄於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東京，亞紀書房，1982年，初版），頁203-737。

不是為建設東北經濟而來，而是要將在東北所獲得的利潤送回日本。通貨膨脹問題不能只在東北解決，必須調整「日滿支」三方面的經濟結構並互相交流，才能收到效果。該報告中指出，要抑制通貨膨脹並非易事，而且特別強調，如果還要持續目前這種規模的戰爭，不僅沒有抑制之法，甚至還會更加惡化。^⑭從上面的論點，不難發現調查人員對日本帝國主義及關東軍的東北政策，抱持不滿與消極抵制的情緒。

「戰時經濟調查報告」是調查部 1941 年度的調查成果。^⑮1940 年日本對華戰事，已明顯出現瓶頸，尤其是經濟體制方面，出現許多難題，須待克服。日本有關當局已體會到日本的戰時經濟，因戰爭的長期性與內外情勢的激變暴露許多矛盾，也面臨重大的障礙，如果不立即採取對策，不但不能建設東亞新秩序，就連想長期打這種規模的仗，都有困難。同時也發現，目前日本戰時經濟體制的矛盾，不侷限於日本國民經濟的某一個部分，已經滲透到生產、流通、消費等層面上，出現生產減低、產銷機構混亂、貨幣不穩、物價上升、國民生活惡化等現象，這種現象並已逐漸擴大到日本勢力下的所謂「日滿支」經濟圈內，產生非常不良的影響。戰時經濟調查即是在這種情勢下，藉實地調查並以科學方法分析，找出原因，謀求對策。^⑯

報告中表示，戰時的日本經濟體制，出現很多矛盾，如果想在中日日益擴大的戰爭當中，消除或緩和矛盾，必須加強經濟統制，也就是說以日本為主的「日滿支」各地區，要建立國防經濟自給自足的制度。這雖是由通貨膨脹調查引發出來的結論，但顯然也意味著日本國力的脆弱性，而且懷疑日本是否還有再戰下去的能力。^⑰「戰時經濟調查報告」與「日滿支通貨膨脹調查報告」，內容有不少雷同之處，結論均對日本的現勢，持悲觀的態度。

總之，上面所列舉的調查報告或建言，無非是對日本的體制，亦即對日本國策的一種批判。然而，這種批判，並不是訴諸行動的反戰運動或反殖民地運動，他們只是在分析實際情勢下，對日本侵略大陸所作的自然反應而已。

滿鐵調查部的調查成果，早期是很受到軍部歡迎的，然而戰事對日本不利的跡象出現時，軍部的態度即逐漸發生變化。軍部的潛意識中認為，提供不少資料或給

^⑭ 滿鐵調查部，滿鐵調查部報，卷 1，5 號，頁 12。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 398-400。

^⑮ 戰時經濟調查報告，收錄於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 778-1571。

^⑯ 原覺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頁 399。

^⑰ 野間清等編，滿鐵調查部綜合調查報告集，頁 44。宮西義雄，滿鐵調查部と尾崎秀實，頁 112。

調查人員諸多方便，然而所得的結論，竟然暗示日本必敗，這可深深刺激他們，檢肅事件因而發生。軍部給他們的罪名，還是與左翼思想有關，認為調查人員是受到馬克斯主義的影響，他們將國策導向危險的境地。軍部甚至具體指出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人員在調查部的自由氣息中，趁九一八事變以來高漲的革新風潮，表面標榜為國策而調查，暗中卻期待社會主義的到來。軍部還指出調查人員以調查部作掩護，組織強而有力的左翼團體，企圖將推動國策的滿鐵調查機關，作為左翼運動的大本營，並以「日滿支」在長期性戰爭下，處於政治、經濟危機為藉口，煽惑日本政府當局撤兵或終止戰爭。因此左翼勢力之漸漸坐大，將危害日本政局及社會。^⑤其實，當調查人員勾畫出日本敗相時，軍部卻不以為自己是罪魁禍首，反而加罪於調查人員，這可以說是當時軍部主控日本政局下的悲劇。

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發生兩次，第一次發生於 1942 年 9 月 21 日，被檢舉者 34 人。第二次發生於 1943 年 6 月 4 日，被檢舉者 10 人，兩次共 44 人。茲將名單開列於下：

(一)第一次檢舉名單 (1942 年 9 月 21 日)

姓名	籍貫	年齡	學歷	經歷	任職滿鐵前之前科	調查部檢肅事件
稻葉四郎	兵庫	34	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3)	小島經濟研究所所員。1934年任職滿鐵，隸屬經濟調查會世界經濟班，產業部資料室，調查部綜合課。	1932年被東京區橋警察局檢舉，拘留 5 日。	
石田七郎	神奈川	34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商務科畢業(1930)	1930年 4 月入滿鐵，曾任職經濟調查會，華北經濟調查所，調查部總務課。		
石井俊之	鹿兒島	37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1930)	1934年 7 月入滿鐵，曾隸屬經濟調查會資料室，支那經濟班，華北經濟調查所等。		
石川正義	山形	31	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7)	1939年 4 月入滿鐵，曾隸屬上海事務所調查室，第一資料股，農業股。		

^⑤ 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頁 2，頁 148-149。

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

花房 森	香川	36	早稻田第一高等學院俄文科肄業(1928)	1940年12月入滿鐵，任職北滿經濟調查所，調查部第三調查室。	1.1927年~1928年分別受到1~58天拘留。 2.1933年6月因違反治安維持法處2年徒刑，緩刑5年。	
狹間源三	兵庫	34	大阪商科大學畢業(1932)	1939年1月入滿鐵，任職調查部一般經濟股，長春分社調查室，東京分社調查室。		
林田丁介	長崎	35	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6)	曾任職鞍山滿洲滾壓機製造廠，1937年9月入滿洲評論社。	1933年10月違反治安維持法處緩刑。	
西 雅雄	東京	48	岡山縣立高梁中學畢業(1915)	1939年8月入滿鐵，任職上海事務所囑託。	1.1921年違反治安警察法禁錮8個月 2.1933年12月違反治安維持法處5年徒刑，緩刑5年。 3.自1922年以來，被檢舉5次。	病死獄中。
堀江邑一	德島	48	京都帝國大學經濟部畢業(1922)	1939年入滿鐵任囑託。	1934年12月19日違反治安維持法處2年徒刑，緩刑5年。	
大上末廣	石川	41	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29)同大學大學院肄業	1932年10月入滿鐵囑託，任職經濟調查會，產業部，東亞研究所，1939年11月任京都帝大助教授。	1936年3月，因2.26事件之嫌，被大連檢察署檢舉。	第一次檢舉時，已任京都大學，仍然被押回大連，病死獄中。
渡邊雄二	廣島	36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1931)	1931年5月入滿鐵，任職鐵道部，經濟調查會，調查部綜合課長春分社，庶務課長。		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判刑5年，緩刑5年。
和田喜一郎	富山	39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畢業(1929)	1929年5月入滿鐵，任職庶務部，上海事務所，總務部調查室，經濟調查會華北駐屯軍囑託，長春分社，華北事務局調查室，華北經濟調查所。		

和田耕作	高知	37	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0)	1934年5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產業部，1937年6月辭滿鐵入內閣企畫院，次年辭職，入東亞研究所，1940年10月再入滿鐵。	自1927年以來前後被檢舉6次。	企畫院事件拘禁8個月後，被徵召赴菲，第一次檢舉時，由菲押回大連。
加藤清	愛知	30	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8)	1938年4月入滿鐵，任職調查部金融股，上海事務所調查室。		
吉植悟	東京	33	東北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1937)	1937年4月入滿鐵，任職地方部地方課，產業部資料室，長春分社業務課。		
吉原次郎	東京	29	拓殖大學商學部畢業(1937)	1937年4月入滿鐵，任職產業部資料室，調查部一般經濟股，長春分社業務課，調查室。		
米山雄治	東京	33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肄業(1936)	1937年12月入滿洲評論社，1939年6月入滿鐵，任職調查部資料課，長春分社調查室。	1.1931年3月因與左翼運動有關，被檢舉。 2.1932年1月參加日本通信勞動公會，再被檢舉。	
橫川次郎	福島	43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	1936年2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調查部資料室，華北經濟調查所，調查部綜合課，長春分社調查室，北滿經濟調查所所長。		
武安鐵男	山口	35	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3)	1933年4月入滿鐵，任職調查部綜合課，鐵道總局調查課，總務課。	1931年以後參加示威運動，被檢舉2次。	
長澤武夫	福島	40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1932)	1934年4月入滿鐵，任職總務部資料課，經濟調查會，上海事務所調查室，興亞院事務囑託，調查部資料課，1942年任浙江省政府外事秘書。		被捕後沒有被移送檢方。
野間清	愛媛	37	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1931)	1931年4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產業部資料室，調查部綜合課，上海事務所調查室，南京支所所長。		

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

野野村一雄	滋賀	31	大阪商科大學畢業(1935)	1939年6月入滿鐵，任職調查部資料課，文化班。	1931年3月因參加校內讀書會組織被拘留13日。	
栗原東洋	千葉	28	北海道帝國大學預科肄業(1938)	1940年8月入滿洲評論社，該社長春支局長。		被捕後沒有被移送檢方。
具島兼三郎	福岡	39	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畢業(1928)	1937年8月入滿鐵，任職產業部資料室，調查部綜合課，同部第三調查室。		
松岡瑞雄	東京	39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1930)該校大學院肄業(1935)	1935年4月入滿洲評論社，1936年2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產業部資料室，總裁室文書課，調查部庶務課，綜合課，長春分社調查室。	1931年9月12日因與日本共產黨關係罪嫌拘留90日。	判刑5年緩刑5年。
小泉吉雄	京都	34	哈爾濱日俄協會學校肄業(1928)	1930年2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委員會，產業部滿洲經濟班，長春分社業務課，東京分社調查室，企畫院囑託。	1928年10月，因參與左翼運動嫌疑，拘留28日。	
佐藤洋	石川	31	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6)	1939年9月入滿鐵，任職調查部第一調查室，長春分社調查室，調查部總務課。		被捕後沒有被移送檢方。
佐藤晴生	新潟	34	早稻田大學附屬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肄業(1929)	1939年8月入滿鐵，任職調查部資料課，華北經濟調查所囑託。	1.1929年8月，因與左翼運動有關，拘留7日。 2.1932年6月違反治安維持法判刑3年。	病死獄中。
佐瀨六郎	千葉	36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1932)	1934年4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產業部資料室。		
三浦衛	富山	32	上智大學預科二年級肄業(1934)	1939年3月入滿洲評論社，1941年4月入大連日日新聞社採訪部。	1933年6月參與左翼運動拘留29日。	
溝端健三	山口	30	哈爾濱學院畢業(1936)	1936年4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俄羅斯調查班，調查部第三調查室。		
下條英男	岐阜	40	東京商科大學畢業(1929)	1938年11月入滿鐵，任職調查部經濟調查室，長春分社調查室。		

鈴木小兵衛	東京	43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肄業(1929)	1935年12月入滿鐵，任職總務部資料課，產業部資料室，調查部第二調查室，1940年入協和會中央本部企劃局。	1.1928年違反出版法罰款20圓。 2.1934年3月參與反對戰爭同盟組織，拘留29日。 3.1934年3月違反治安維持法判刑2年，緩刑4年。	
鈴江言一	東京	49	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二年級肄業(1919)	1926年入滿鐵，任職調查課囑託，北京經濟調查所囑託，上海事務所囑託。		被捕後沒有被移送檢方。

(二)第二次檢舉名單(1943年6月4日)

石田精一	岡山	38	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畢業(1930)專攻經濟學	1938年入滿鐵，曾隸屬北滿經濟調查所，調查部第二調查室，第一調查室，華北經濟調查所。	1.1934年4月，因違反治安維持法判2年徒刑，緩刑4年。 2.1937年5月因違反治安維持法起訴判緩刑。	
石堂清倫	石川	40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畢業(1927)	1938年7月入滿鐵，曾隸屬調查部資料課，大連圖書館。	1.1927年5月1日在東京芝公園警援勞動節，被檢舉。 2.1933年11月因違反治安維持法判刑2年緩刑5年。	
伊藤武雄	愛知	49	東京帝國大學政治學科畢業(1920)	1920年7月入滿鐵，任職總務部調查課，駐北京總務部資料課調查課長，經濟調查會天津等經濟顧問，上海事務所所長。		
發智善次郎	埼玉	32	東京商科學校附屬高等專門部畢業(1933)	1933年8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天津事務所，東京分社，調查部綜合課，總務課。		病死獄中。
田中九一	東京	48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1921)	1921年5月入滿鐵，任職東京分社東亞經濟調查局，經濟調查會，產業部資料室，華北經濟所長。		

代元正成	福岡	32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商務科肄業(1933)	1936年6月入滿鐵，任職北滿經濟調查所商工班，長春分社調查室。	1933年9月25日違反治安維持法判刑1年，緩刑3年。	
三輪武	山口	38	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31)	1933年4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天津事務所，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東京分社調查室。		
守隨一	東京	40	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28)	1938年12月入滿鐵，任職調查部囑託，長春分社調查室。		病死獄中。
平野蕃	岐阜	35	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畢業(1934)	1935年5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產業部，北滿經濟調查所，長春分社調查室。	1933年4月，因參與左翼運動，自首，受訓戒。	
枝吉勇	東京	40	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927)	東亞經濟調查局局員。1935年11月入滿鐵，任職總務部資料課，產業部資料室，東亞研究所，調查部總務課長。	1928年3月，因與3.15事件有關，拘留14日。	從戰地蘇門答臘押回大連。

註：(1)資料來源；依關東憲兵隊司令部編，在滿日系共產主義運動，頁 65-85，頁 92-111，整理而成。

(2)上列名單，係 1943 年 12 月調查所得者。

上列被檢舉的 44 人中，以學歷而言，畢（肄）業於帝國大學的有 29 人（其中東京 17 人，京都 8 人，九州 2 人，東北 1 人，北海道 1 人），其他依次為上海東亞同文書院 3 人，早稻田大學 2 人，東京商科學大學 2 人，大阪商科學大學 2 人，明治大學 1 人，拓殖大學 1 人，上智大學 1 人，其他（高中程度）3 人。再從年齡來看，大都是三十幾歲。可知被檢舉者，都是調查部中高學歷而年輕的菁英。

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可以說是「權力與知性」的衝突。⁹⁹事件發生以前，已有多起小的壓抑事件發生，調查部內部已有人預感災難即將臨頭。例如 1940 年尾崎秀實在上海時，曾告訴中西功，自己身邊似乎罩著一種陰影，這種感覺，至 1941 年時更加強烈。又如 1941 年 4 月，調查部次長押川一郎在「戰時經濟調查計畫」的協調會上致詞時，有如下一段話。他說：「目前國內外情勢變化很大，很可能會有壓制思想的問題發生，很遺憾，在我們的同仁之間，已有人被檢舉（應該是指

⁹⁹ 草柳大藏，實錄滿鐵調查部（下），頁 361。

1941年4月的企劃院事件），此時此刻，希望大家要珍惜自己，不要引起別人懷疑。」^⑩身居高層幹部的押川，一定聽到有不利於調查人員的風聲，爲了愛惜自己屬下，才作此暗示。據說日本的敗相逐漸明顯時，首相東條英機已作了採取行動的準備。他認爲日本如果戰敗，可能會引起左翼知識分子的騷動，防範之策，只好加以拘捕。東條還認爲，不管是否左翼，只要是知識分子，全部都是危險人物，所以盡可能範圍內，不論是在國內或國外，要通通加以拘捕，人數約在五萬人左右。而左翼知識分子的巢穴滿鐵調查部，即被視爲第一目標。^⑪

其實，在1942年9月，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發生以前，軍部已採取行動，如1941年4月的「企畫院事件」、同年10月的「尾崎秀實事件」、11月的「綏化合作社事件」，1942年3月上海的「中西功事件」等，已有滿鐵調查機關的人員被捕，^⑫顯示箭頭已指向調查部。

調查部第一次檢肅事件發生前夕的1942年5月，滿鐵總裁大村卓一前往東京時，首相東條曾對大村表示，下一波就要向滿鐵下手。東條並派其親信憲兵少將加藤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負責此項行動。調查部得知消息後，隨即由調查部總務課長枝吉勇（第二次被檢舉）前往大連憲兵隊交涉，希望對被檢舉的人員，不要有虐待行爲。^⑬第一次檢肅事件發生後，滿鐵調查部又派總務課長北條秀一（枝吉勇的繼任者）前往長春，與該地憲兵隊松本滿貞中校商議，請求不要再將事件繼續擴大，而松本當時曾出示100名左右準備在下一波檢舉的名單（北條秀一亦在名單中），調查部爲表示與軍方配合，主動提出10名可以檢舉的名單，軍部爲回報調查部的誠意，第二次僅檢舉10名即作罷，^⑭顯示滿鐵當局在這次事件上的處理，相當得當。

被檢舉的調查人員分別拘禁在長春、奉天、本溪湖、敦化、哈爾濱、大連、錦州等地憲兵隊的拘留所，在很長的拘禁期間只偶而進行調查，並沒有移送審判。因爲憲兵隊當局認爲思想犯與一般罪犯不同，必須讓他們在思想上作較長時間的反

^⑩ 宮西義雄，滿鐵調查部と尾崎秀實，頁108。

^⑪ 這則消息是伊藤武雄從長谷部將軍（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的參謀，後入滿鐵任囑託）那裏聽來的。見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240。

^⑫ 「企畫院事件」被捕者有和田耕作、川崎巳三郎。「綏化合作社事件」有鈴木小兵衛、佐藤大四郎、花房森、小松七郎。「中西功事件」有尾崎庄太郎、臼井行幸、新庄憲光、津金常知等。見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237。宮西義雄，滿鐵調查部と尾崎秀實，頁108。

^⑬ 宮西義雄，滿鐵調查部と尾崎秀實，頁110。原覺天，滿鐵調查部とアジア，頁261。

^⑭ 石堂清倫等，十五年戦争と滿鐵調查部（東京，原書房，1986年，初版），頁183。

省。所以他們被捕以後，最快者兩個月，慢者甚至半年，沒有受到任何調查。至於他們在拘留所受到的待遇，由於東北的拘留所或監獄，原本就沒有要收容日本人，所以沒有特別的設備，但憲兵隊視他們為社會地位很高的滿鐵高級職員，因此在事情處理上很慎重，盡量在身心上不加以苛待；不僅囚房給予單人房，非常注重環境衛生，伙食也與憲兵同等待遇，而且沒有採行任何不當的審問，尤其拷問，更是被嚴厲禁止。據所有當事者在後來撰文回憶或談到這段歷程時，都沒有提到被拷問刑求的事情，可見，這一點憲兵隊是做到了。前面已經提到，事件發生前夕，調查部總務課長枝吉勇曾向憲兵隊要求善待被捕人員，而憲兵隊司令官亦保證不對被捕人員作肉體上的傷害（即刑求），伙食與憲兵一視同仁¹⁵，足證軍部在採取行動前，是得到滿鐵當局的諒解與默許的。

此次事件自始至終，似無具體罪證，因為這是一宗對可能產生的預期事實，加以處罰的案件，所以令承辦檢察官及法官感到很困擾。被捕的 44 人中，長澤武夫、栗原東洋、佐藤洋、鈴江言一等 4 人，在沒有移送檢方之前即被釋放，其餘 40 人則移送法辦。而被移送者之中，西雅雄、大上末廣、發智善次郎、守隨一、佐藤晴生等 5 人，因營養不良及傷寒，先後病死獄中。1944 年秋天，檢方正式將其中 21 名提起公訴，其餘則因罪證不足而不予起訴，並陸續釋放。1945 年 5 月，在長春法院宣判，除松岡瑞雄、渡邊雄二，判處 5 年徒刑（緩刑 5 年），另二人處了 3 年（緩刑 4 年）外，其餘一律處 1 年徒刑（緩刑 3 年）。判刑者均以緩刑處理，自是全獲釋放¹⁶。轟動滿鐵調查部的檢舉事件，至此終告落幕。

這次事件，滿鐵調查部的優秀調查人員，大部分都被捕，調查部經此打壓，已逐漸喪失往昔的朝氣與活力，實行大型調查的理念，也完全被粉碎。而滿鐵經此次事件後，惟恐後患再來，作了一次人事大搬風，將倖免於難者紛紛他調，或派遣到海外，調查士氣及能力，因此更加低落。調查部的工作，也由過去的璀璨，趨於平淡，僅處理一些日常業務，一直到日本戰敗滿鐵解體，調查部只是苟延殘喘，再也無法起死回生。

七、結 論

「大正民主」時期，自由主義的左翼思潮，傳揚日本學術界與學生界。研究這

¹⁵ 同上書，頁 182。

¹⁶ 石堂清倫，わが異端の昭和史，頁 269-270。伊藤武雄，滿鐵に生きて，頁 253-254。

種思想，更成爲一時風尚。但日本政府是採取禁止態度的，所以因思想問題遭受取締的事件，層出不窮。尤其自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政府對自由主義各派人士的彈壓，更是雷厲風行。不少追求所謂新思潮的人，在日本政府大力掃蕩下，無法在其國內立足，乃紛紛找尋新的天地。

滿鐵爲日本在東北經營殖民事業的大本營，由於與日本地理環境的區隔，加上它擁有自主與獨立性的傳統，遂得容納各種不同理念的人。尤其是調查部，可以說是滿鐵的智囊部門，在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力主調查應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原則下，使調查人員獲得更大的發揮空間，在工作上得到相當大的自由。

1939年4月，調查部改組前後，因配合中日戰事擴大而進行各種綜合性調查，調查部求才若渴，在日本國內因思想問題無法立足的社會主義者，也因風雲際會，大批湧入滿鐵調查部。由於他們標榜自由，加上調查部自主與獨立的傳統，以及高層人士的恢宏胸襟，不僅給調查部帶來濃厚的自由氣息，也讓他們感到此地是可以一展抱負的海外樂土，但也就因爲這種自由的氣息，招致檢肅事件的發生。

大家都知道，調查部的任務，在於提供日本軍事行動所必須的重要參考資料。調查人員秉持理性、客觀的態度從事調查並分析資料，所得的結論，縱使對殖民政策或軍事行動等國策有所批判，但他們堅信，這是純粹的科學性的調查與研究，並無任何利害或主觀因素存在。但是他們都忽略了現實的環境與情勢。因爲調查部明定其任務在於動員所有智慧，爲政府當局建設東亞新秩序提供具有前瞻性與正確性的計畫。換言之，調查部是擔荷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動的一部分任務。

1939年以後，調查部的各種綜合調查報告，皆作出對日本政府及軍部不利的結論，不但有負他們的使命，也深深觸怒軍部。後人常批評當時的日本軍部不但是現實主義者（Realist），也是犬儒主義者（Cynicism），認爲調查部的檢肅事件是科學的調查研究，向軍部法西斯主義挑戰所導致的彈壓行動。因爲調查人員所標榜的「科學的調查研究」，在敗相日益明顯的軍部而言，簡直是反國策的。這種由科學與國策所產生的矛盾，讓主宰國政的軍部，向調查人員採取檢舉方式來解決，實不意外。

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是一種「權力與知性」的衝突，而大部分當事者在事後的回憶中，咸認爲該事件是由軍部一手捏造的，罪狀是莫須有的。但在現實的環境下，知性往往受制於權力，這個事實，在歷史上不斷地重演，這一點，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